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4.002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凉山彝区的民族政策略论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

李晓旋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600041)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在凉山地区开展的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基层人民政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工作,以及对彝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尊重彝族风俗习惯信仰、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具体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彝族地区经济贸易得到发展、文化教育水平得到提升,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彝汉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实践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在凉山彝区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尝试,这些成果的取得为后来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凉山彝区

中图分类号:D633.0;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4-0006-06

On 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Liangshan Yi Region from 1949 to 1956

LI Xiaox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0004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rty worked to preach Party's ethnic policies, build basic-level state power organs, train minority cadres, unite upper-class Yi people, honor Yi people's customs and beliefs, and oppose the narrow Han chauvinism in Liangshan Yi region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rise of Party's prestige among the mas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Yi and Han people have been achieved. The results have proved that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 in Liangshan Yi region in the early day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great success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 concrete endeavor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democratic reform.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arly day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hnic policy; Liangshan Yi reg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谈及民族工作时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时局,以及民族地区尚不明朗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以凉山彝区为例,1950年3月12日,西昌战役打响,这场

历时25天的战役使祖国西南的彝族地区全部解放,“西昌战役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以西昌为‘大陆反攻复国基地’计划的彻底破产,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负隅挣扎的迷梦。大小凉山解放,意义深远,千百年来的奴隶制度开始动摇,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思想等领域,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凉山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2]。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凉山彝族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和取得的成果,吴桃《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

收稿日期:2021-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南方少数民族小文种文献保护与整理研究(17ZDA309)。

作者简介:李晓旋(1993—),女,安徽阜阳人,文献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古籍与地方文献。

党在凉山彝区的民族政策刍议》对党在长征时期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展的民族工作和实施的民族政策做了梳理。罗艳《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凉山产生的影响》主要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的民族政策对凉山的影响。张千友、董洪清《少数民族聚居区全面小康:进度监测、现实困境与政策突破——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实证研究》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对凉山地区脱贫工作的帮扶。本文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凉山彝区推行的民族理论和践行的民族政策,试图重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在凉山彝区开展各项民族工作的史实,剖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成功的经验和实践例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凉山彝区基本概况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1956年民主改革前,其旧有的奴隶社会制度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还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奴隶们,仍然生活在腐朽落后的奴隶制度当中,凉山地区的谚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奴隶们悲惨的生活。“奴隶制度最野蛮,娃子比牛马都不如。跑马头上配金簪,娃子颈上锁铁链。”“虎豹再凶只吃肉,豺狼再狠只喝血,主子吃人不吐骨头。”“屋前九垧地,没有一把土是娃子的,屋后九片林,没有一棵树是娃子的。”“娃子”是对当时奴隶的统称。“按照当时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全体社会成员,主要依其血缘因素及经济占有和人身权利等条件,大体上可以分为兹莫、诺伙、曲诺、安家、呷西五个等级”^[3]。这样不仅不同等级之间矛盾重重,而且在同一个等级内部也存在矛盾。

1952年胡庆均曾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北山黑彝家做过田野调查,在他后来撰写的田野调查日志中对当时彝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就黑彝和白彝的日常生活比较起来,黑彝只是房子高大宽敞,食量充足并且常有肉吃,白彝则是房子矮小,食量不够,肉食很少,其他的生活用品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这种情形说明了彝区生产力的低下。红毛拉乌的农业生产,正代表了一般北山彝区,主要农作物只有洋芋、荞子和燕麦数种,我们调查了许多白彝的家庭,各种农作物的平均收获量只有种子的五倍到十倍”^[4]。红毛拉乌村位于海拔1400米左右的山区,是凉山彝区海拔较高的一个村子,也比较靠近汉区。这里黑彝和白彝生活水平都

很低,讲求精耕细作,粮食种类也很单一,农业生产条件也跟不上当时解放的汉区,更没有工业可谈,只有一些手工业的小商品。总之,红毛拉乌村的经济状况基本可以代表当时整个凉山彝区的经济生活水平。

凉山在1950年解放前一直处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剥削下,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汉族和少数民族间互相仇视。因此,为了尽快消除民族隔阂,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建党组织,开展凉山民族地区工作,在贯彻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方面,采取了建立自治政府和联合政府两种形式。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民族政策,并进行了多项尝试和实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在凉山彝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一) 宣讲党的民族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争取彝族上层对政府的支持,通过座谈会、亲自去家中拜访、发放粮食衣物、免费治病的方式逐步消除他们的戒备和不信任。通过这些接触与联系,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权力的基本政策。

由于长期的闭塞,不少彝族同胞对于口头宣讲并不完全相信,并且自大心理严重,认为“汉人有成都府,彝人有牛牛坝”,不愿意沟通。针对这种情况,主持民族工作的人员又组织上层头人到汉人聚居的大城市参观,开阔眼界。“几年来组织了上层人士三千多人次分期分批到重庆、昆明和首都北京去参观,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建立了感情”^[5]。彝族人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强大,感受到这是一个新的政党,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上层思想的转变,他们不仅自己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员,积极配合民族政策的实施,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开展其他彝族同胞的工作。“从1953年夏季开始,到1955年2月底止,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从南到北逐步全面开辟了凉山自治州的工作。在新进入的地区,大多数上层人士都以他们特有的头人身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沟通各家支的关系,帮助当地头人解除疑虑,靠近政府,积极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并在清匪肃特和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

(二) 建立基层人民政府

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解决凉山彝区

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条件和彝区群众利益与接纳程度。邓小平指出“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是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6]。针对在凉山地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的群众基础和现实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当时的西康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西康省委制定了三步走的策略:(1)宣传和筹备阶段。在这一时期,通过登门拜访和举办座谈会的方式,召集彝族上层学习党的民族区域政策,宣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消除不解和误会。(2)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始试点。“1950年末,在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的直接领导下,在西昌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西昌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初在西昌县红毛玛姑彝族聚居区进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成功地建立了红毛玛姑彝族自治区(区级)……4月15日盐源县联合政府成立,4月22日昭觉县彝族自治区(县级)人民政府成立”^{[5]21}。(3)全面推行阶段。1951—1953年间,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区推行,1952年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区,随后冕宁、盐源、盐边、宁南、会理等五个自治县联合政府也相继成立。

这些主要由当地彝族上层和部分劳动人民组织领导的基层人民政府,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首先它以事实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要求当家做主的愿望,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热情,牢固地树立了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威信。其次,有效地消除了民族隔阂,缓和了彝汉关系,维护了民族内部团结。最后,团结了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开展了民族统战工作,维护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有力地驳斥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历史的倒退、落后、阴谋等论调,为凉山地区下一步工作的推行打下了基础。

(三)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毛主席在1949年11月强调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7]。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凉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主要通过:(1)开放民族干部培训班,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教育。“采取理论联系实际,以课堂教学为主与小组讨论和辅导相结合的方法”^{[5]25},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加深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2)优中选优,特别干部特别培养。组织学习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提高思想文化水

平,对于理论基础扎实,在实际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干部,重点培养。(3)专门人才的信任使用。对于本就受过教育,思想开化的彝族上层和知识分子,根据实际派遣到岗位上工作,给予实权和信任。

通过以上多管齐下的措施施行,凉山地区少数民族的干部队伍不仅逐年增加,而且干部素质也有较大提高。“到民主改革前的1955年10月,西昌专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区有民族干部一千五百二十一人,其中州级五人,县级四十四人,区级二十二”^{[5]2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在凉山彝区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人才,为接下来民主改革积累了人才力量。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在凉山彝区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

(一) 对彝族上层的统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策。在工作中,要求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共同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复杂,条件艰苦,许多政策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故意制造的矛盾,导致西南地区民族情况复杂。1950年7月,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如何解决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时谈到政治的、经济的问题,一定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6]1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很多彝族上层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剥夺,对于党的民族政策还处于犹豫和观望状态。与此同时,解放战争时期逃至凉山彝区躲藏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和当地的土匪勾结一起,对党的民族政策造谣、破坏,挑唆当地彝人破坏彝族同胞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破坏新生的民族政权,使局面复杂化。面对这一情况,党和政府坚持民族政策,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一方面对少数被蒙蔽裹挟的彝族头人进行党的政策教育,争取他们的理解,等待、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一方面进行剿匪和肃特行动,揭露特务、恶霸、地主的阴谋。大多数彝区的上层和普通群众,都能积极协助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进行剿匪工作,主动为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带路、报信,有的直接参加了剿匪的斗争。盐

边县彼时属于西康省西昌专区,作为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之一,兵匪、恶霸、地主横行。“盐边大恶霸地主葛绍武,逃到彝族地区山中隐藏,是(我党)做好彝族头人李拉什子的工作后,由李拉什子的武装奴隶抄马作堵将葛绍武击毙。由于党和政府做好了民族地区的治安工作,保障了民族地区的生产,又促进了民族团结,从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8]。通过团结上层、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党的民族政策迅速在彝区生根发芽,农业生产、医疗、贸易等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为搞好民族工作和实行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尊重彝族风俗习惯

邓小平同志主政大西南期间,曾多次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对待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邓小平始终采取尊重的态度,并说“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要老老实实”^{[6]170},强调工作队在处理问题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正是由于风俗习惯不同,才有误会和摩擦,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能勉强去学,学不会的要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

凉山地区的彝族认为万物有灵,信仰祖先神、山神等,忌讳用手指彩虹,忌讳从锅庄上跨过等;生活习惯上喜食荞麦、燕麦、牛羊肉,也吃猪肉,忌吃狗肉、马肉。从1950年开始,凉山工委的同志对进入凉山工作的人员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教育,并且将彝族地区的禁忌编印成手册,人手一本,具体包括不许摸彝族同胞的“天菩萨”,不许在“神山”砍柴,不许踩踏锅庄等。另外,吸纳了彝族群众对于消除侮辱性称呼的意见,先后在越西、冕宁、昭觉等地,将“平夷堡”“倮倮沟”“镇夷堡”等地名,改为“平等堡”“解放沟”“和平堡”等称呼。

(三) 反对大汉族主义

毛主席在1953年3月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9]。党和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明确表示要各级领导干部消除“大汉族主义思想”,这是我党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一直贯彻的方针。

凉山人民在1950年解放前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彝族人民被当作“土匪”和“蛮子”,汉族也认为彝族“畏威不怀德”。针对两个民族间长期以来形成的敌对和仇视,消除地区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我党在处理凉山彝区民族问题时

慎之又慎,主要采取了如下方针政策。

1. 在全体党员、解放军、彝族上层、汉族代表中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要求各阶层团结一致,肃清国民党残余和危害百姓生产安全的土匪、恶霸。对于彝汉普通民众中间出现的矛盾纠纷,协商解决,达成互相尊重风俗习惯,互相友爱的公约。

2. 针对彝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长期“打冤家”问题,以缓中求进的原则进行。所有反霸、减租、退押等工作,在彝族聚居地区均不进行。彝民内部的改革问题由彝族人员自行决定。彝族内部的冤家械斗,按照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由人民政府出面,协商解决。“据统计,经人民政府出面,共调解了各种冤家纠纷一千五百二十一”^{[10]516}。

3. “娃子”与奴隶主之间的问题,以温和不激化矛盾的态度,分而化之解决。对于逃跑的娃子,原则上动员回去,在保证不虐待娃子的前提下,由头人领回。实在动员不回去的,以经济补偿的方式赎回。总之,在彝区执行这一系列政策时,区委党组织人员都首先征得彝族头人和彝族大部分人员的同意,结合实际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取得的成果与民众反响

(一) 彝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凉山彝区,主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生产力十分低下,不少地方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五六十斤。对于紧缺的盐巴、布料等生活用品,全靠商贩运进山,商贩又以极不平等价格换取当地农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00斤牛羊皮只能换得土布1.46件,2斤天麻才能换到1斤盐巴。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落后、耕作方法简陋、粮食产量低等困难现状,中央政府实施了许多政策:(1)辅助生产,解决温饱问题。为少数民族群众免费发放农具、拨给生产资金、减免农牧业税、无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在部分彝区,一些头人担心政府发放的农具、救济粮会导致群众向政策“倒戈”,阻挠群众认领。区党委特别强调要采取稳妥恰当的方法,指出无论是民族贸易、农业生产还是交通邮电都要征得彝族上层的同意,避免发生冲突,政治工作、民族工作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2)开展民族贸易工作。“民族工作进展到哪里,经济贸易工作也开展到哪里。随着民族工作的进程,到1955年已正式建立起州的民族贸易公司一个,县(办事处)公司九个,营业部二个,区、乡购销组四十

三个”^{[5]31}。规范的贸易行业,不仅保证了物资的供应,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不公平交易的现象大大减少。公平的市场刺激了当地农产品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3)扩大物资供应。“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生产资料的品种、数量增多,主要生活必需品食盐、土布等大量增加。据统计,仅 1955 年即供应食盐五百六十多万斤,土布三百一十多万匹,基本满足了各族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5]33}。

(二)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解放初,历代统治阶级遗留下的民族隔阂很深,反动派借办‘边民学校’给彝族人民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对送子弟读书顾虑重重,怕送子弟上学成了‘人质’,怕读书成了‘洋人’,怕读了书回不来了等等。加上劳动群众生活贫困,无力送子女上学,因而办学相当困难”^{[5]37}。为了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党和政府除了配备充足的资金,让彝族子弟免费入学以外,同时还给予生活物资上的供给。1950 年在有关部门帮助下对不规范的老彝文进行改革,并参照汉语小学教材,结合民族风俗习惯编译新彝文小学教材推广使用。关于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课的问题,允许各级学校按当地少数民族意愿和需要自行设课。授课教师由西昌地区民族干部学校委托培养,加上遴选平时成绩优异,年纪较大的学生扩充教师队伍。

经过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施行,“据省教育厅统计,1955 年西昌、凉山各类学校已经发展到六百九十二所,为解放初的一点四倍;在校学生共七万八千八百八十六人,为解放初的二点九八倍;有教职工二千八百二十六人,为解放初的二点六倍”^{[5]40}。凉山彝区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三) 党在群众中威信提高

1951 年的《人民周报》上登载了由西康大凉山彝族赴京文工队人员撰写的《彝族人民感到了祖国的温暖》一文,文中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充分认同,表达了彝族人民真实的感受。“应该承认,在解放之初,大凉山的人民对于共产党、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的。他们怀疑汉族人民中是否有真正的好人。但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彝族人民亲眼看到各级人民政府及每一天工作人员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他们逐渐由怀疑、畏惧转为拥护热爱了。”^[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彝族地下党员只有三十八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许多彝族青年参与入党教育培训班。“截至 1955 年底,西昌、凉山地区在民

族干部、彝民团战士和民族工人、学员中发展党员四百六十七名,其中彝族二百七十五名,回族九十八名,藏族二十五名,傈僳族二十一名,其他少数民族四十八名”^{[5]49}。

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提高,得到了更多群众的信任。凉山彝族中至今还有“牛的劲在颈上,马的劲在腰上,奴隶的劲在党的领导下”“山与山靠白云相连,坝与坝靠绿水相连;各族人民靠党的民族政策相连”“高山的蜜蜂酿出的蜜是白生生的,翻身的奴隶献给共产党的心,是红彤彤的”等歌颂共产党的谚语歌谣。

(四) 彝汉民族关系的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凉山地区的彝民中流传有“石头不可以当枕头,汉人不可以交朋友”这样带有破坏民族和谐的谚语,彝汉之间经常有冤家械斗,彼此不信任。党在开展民族工作时依然选择先与彝族上层搞好关系的策略。“在逐步与彝族头人接触,做好工作的基础上,地、县两级都在 1950 年 12 月前后召开了各民族代表会议,学习《共同纲领》、宣传民族政策”^{[5]14}。除了会议精神的学习,党和政府还组织彝族上层进行参观学习,实际调研,亲眼见证国家的变化。彝族女土司(阿卓史卓)当时就作为代表被请去大城市参观,亲眼见证了民族政策带来的彝汉关系的改变和国家的焕然一新。“凉山解放后不久,我作为一个很大的彝族观光团的一员,参观了泸县、重庆——四川省的大城市。我们都穿了我们的民族服装,说着我们自己的语言……谈到我们的民族服装,就是连我自己上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在汉人之中穿过,因为怕受到迫害和歧视。现在却没有人叫我们‘蛮子’了。我们听见人家,甚至于小孩都称呼我们为‘兄弟民族’或‘彝胞’……汉人和彝人一同工作来改善农业……对我来说,解放就是从仇恨和耻辱中解放出来”^[11]。

五、余论

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复杂情况相结合的伟大尝试,是党的民族理论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探索和实践。凉山地区推行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给了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实践证明,党的民族政策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良方。展望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

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凉山彝区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迎来了新的机遇和要求,相信凉

山儿女紧密围绕在党中央周围,一定能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01)
- [2] 佚名.西昌战役:揭开凉山历史崭新一页[N].凉山日报(汉),2011-07-10(A02).
- [3] 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89.
- [4] 胡庆均.访问北山彝族——在马水沟黑彝家做客[J].旅行杂志.1952-11.
- [5] 中共凉山州委党史研究室.凉山州解放初期民族工作[M].1990:5,6,21,23,16,31,33,37,40,49,14.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6,168,170.
- [7] 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2006:126.
- [8] 四川省盐边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盐边少数民族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210.
- [9] 艾四林.《论十大关系》导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96.
- [10] 蒋正才.彝族人民感到了祖国的温暖[N].人民周报.1951-25.
- [11] 佚名.土司的女儿[A]//“中国建设”选译.北京:中国福利会中国建设杂志社,1956:42.

(上接第5页)

制也是清政府在土司地区施用的一种统治手段。然而它又是无奈的,土司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本可能从根本上革除,而直接进行改土归流则可能引起土司的反抗和地方社会动荡,因而只能采取一种缓

冲的手段,满足土司各个方面的要求和利益,为改土归流赢得时机、创造条件,因此土司分袭制也可以说是清政府向土司的一种妥协,是改土归流前的一种施治举措。

参考文献:

- [1] 汪森.粤西文载:第四册:校点本[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2]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世宗嘉靖实录[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89.
- [3] 刘尧海.苍梧总督军门志[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 [4] 张廷玉.明史:第2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世宗嘉靖实录[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89.
- [6] 尤佳.试析土司分袭制度创立的历史背景[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1).
- [7] 赵尔巽.清史稿:第29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 [9] 杨甫旺.彝族纳楼土司世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0]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15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1.